

建军与铸魂：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丰富和发展

叶桢 杨海贵¹

【摘要】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关乎中国革命前途和人民命运的历史性抉择，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发动南昌起义。以南昌起义为起点，历经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一支完全区别于古今中外旧式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成立。南昌起义中应运而生的八一精神，源于伟大的建党精神，体现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政治特质和军队是人民子弟兵的本质特性。建党、建军和建立新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个里程碑，与此相应的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矗立的三大坐标，即以红船精神等为代表的建党精神坐标，以八一精神等为代表的建军精神坐标，以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等为代表的建立新中国精神坐标。八一精神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南昌起义 八一精神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 (2021) 08-0184-10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然而英勇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高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大旗，领导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南昌起义，走上了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道路。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1]。彪炳史册的革命实践必然产生千古传诵的革命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指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1]这一科学论断，道出了南昌起义在“党指挥枪”原则形成过程中的源头地位和发端意义。南昌起义中形成的“坚定信念、听党指挥，为民奋斗、百折不挠，敢为人先、勇于创新”^{[2] (P29-36)}的八一精神，是新型人民军队优秀基因和建军精神之源，继承发扬了伟大的建党精神，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丰富和发展，成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

一、维度坐标：“三个伟大事件”的历史文化考量

南昌起义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证明了党吸取大革命失败惨痛教训，找到了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条在中国唯一正确的道路，为中华民族站起来作出了巨大贡献。马克思认为，人类创造历史并非是非肆意和主观的，而是根据具体实际和既往承继下来的条件去创造。^{[3] (第1卷, P584)}

南昌起义和八一精神，源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滋养，融合风起云涌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得到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农革命运动和北伐战争实践中，形成的坚定政治品德、顽强斗争意志、睿智的革命风范，以及成功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使党在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转折关头，能够独立思考和果断决策，领导发动具有“开启中国革命新纪元”^[1]意义的南昌起义，形成了伟大的八一精神。

¹作者简介：叶桢，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八一精神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江西南昌 330038）

杨海贵，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八一精神研究中心讲师，博士。（江西南昌 33003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南昌起义与中国共产党建军精神研究”（18BDJ080）

南昌起义和八一精神的产生，集中反映了中华文化中的爱国主义情操和自强不息的品格，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哺育的结果。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岁月里形成了“勤劳俭朴、艰苦奋斗的民族性格”，“创榛辟莽、敢为前驱的创造精神”，“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知行方式”，“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民本意识”，以及“天下为公、不负家国的爱国思想”和“义薄云天、洁身自好的高尚品格”。^{[4] (P194-197)}每个时代爱国主义虽然有着不同主题、载体和表现形式，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却是永恒的旋律。

毛泽东曾说：“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的领袖。”^{[5] (第2卷, P623)}南昌起义主要领导者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爱国主义者们，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时刻，以发动南昌起义的实际行动，书写出为中国人民求解放和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和复兴的可歌可泣篇章，成为鲁迅先生所赞颂的“正是中国的脊梁”^{[6] (第6卷, P118)}。

中国共产党人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是革命文化的开拓者。八一精神的产生，是五四运动以来“启蒙与救亡的自觉广泛的统一”“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的统一”“刻苦耐劳的精神与进取创新的精神的统一”“独立自主的精神与无私奉献的精神的统一”^[7]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发扬光大，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支撑。

南昌起义和八一精神的产生，是马克思主义武装斗争理论在中国生根、开花的结果。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大革命失败和土地革命高潮尚未到来之国情，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关键一步。马克思认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8] (第1卷, P819)}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暴力革命”^{[9] (第2卷, P548)}。《共产党宣言》认为国家政权问题是全部革命的首要问题，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将自己国家资产阶级所组成的国家机器打倒，共产党人应当旗帜鲜明地亮明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公开声明只有通过暴力才能推翻一切现存社会制度来实现自己的目的。^{[3] (第1卷, P262-285)}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亲自参加欧洲革命实践和工人运动的客观要求，一针见血地指出，暴力当然不是赤手空拳和棍棒，而是“陆军和海军”^{[3] (第3卷, P206)}，要立即使用步枪、马枪、大炮和弹药武装整个无产阶级，“必须用六月革命——霰弹和街垒来回答”^{[3] (第1卷, P302-303)}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的科学性。1871年3月18日，法国人民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梯也尔政府统治，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政权——巴黎公社诞生。

巴黎公社的“暴力革命原则”，在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中得以发扬光大，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国家必须依靠暴力革命理论成功实施，在世界上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揭开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篇章，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10] (第1卷, P34)}，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5] (第2卷, P666)}，南昌起义枪声呼应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八一精神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在风雨如磐的中国大地上结出的灿烂果实。

南昌起义和八一精神的产生，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开展军事斗争的思想认识，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等都发表过对马克思主义武装斗争的见解，建党前后就开始注意军事问题和探索建立一支有别于封建军阀部队的军队。

陈独秀认为：“革命的武力至少必须与民众合作，必须受民众和党的制裁，才能免除形成军事独裁走到反民众利益那边去的危险。”^[11]周恩来在《少年》第六号发表文章认为，要进行真正意义的革命，必须有极为坚强和极有组织的革命军队，否则是打不倒军阀的。瞿秋白在1926年5月《新青年》刊发了专门论述武装斗争的文章——《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极其需要正式革命的军队。

中国共产党诞生使中国革命焕然一新，党的“一大”纲领制定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主张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12] (第1册, P1)}1922年中共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认为在中国打倒军阀只有开展民主革命战争，其他所谓

的姑息的妥协的伪和平方法，是不可能得到真正和平幸福的。^{[12] (第1册, P97)} 党的“二大”根据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13] (第1册, P116)} 的最低纲领，主张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起“劳农专政”，铲除私有财产制度，逐渐实现共产主义^{[12] (第1册, P133)}。

然而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在建党以后一段时期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直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创建黄埔军校，才“进入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5] (第2卷, P547)} 在黄埔军校创办伊始，中共就派出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等直接参与办学和军校具体军事实践活动，并从各地选派大量优秀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以解决当时党对于建军处于“无专门人才，无专业经验，无经费及物资保障”^[14] 的窘境。在黄埔军校建立起的政治思想工作制度、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制度等，后逐渐推广到国民革命军中，既确立了国民党的党军体制，也为中共建军和治军提供了借鉴。

1924年冬，中国共产党从黄埔军校抽调一批党、团员作为骨干，组建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是中共直接掌握的第一支约150人的武装力量。1924年冬，中国共产党首先在中共广东区委建立了军事运动委员会，后改称军事部，由周恩来兼任书记。这是党内成立的第一个“军委”，不久党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军事领导机构，周恩来担任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在鄂、湘、浙、苏、豫、陕、沪、渝、赣等地地方领导机构中设立了军事部或军委或军事特派员等，负责开展相关工作。

北伐战争之前，国民政府采用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统一改编了国民革命军，共产党人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罗汉、林祖涵分别担任第1、第2、第3、第4、第6军的副党代表¹兼政治部主任，其中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成为北伐中著名的“铁军”。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²

1926年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认为：“军事工作，目前在C.P.里已占最重要的地位，中国C.P.应特别注意此项工作。”^{[15] (P167)} 党的“四大”要求“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农民协会组织建立的农民自卫军等武装，在全国各地广泛建立起来”^[16]。不久就形成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村革命高潮。

1925年中共召开“十月扩大会议”，明确提出要“有组织地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忠实的分子”^{[12] (第1册, P469)}。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等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为在中国开展城市武装起义和建立人民政权作了大胆尝试。由于年轻的党受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全党甚至没有夺取政权的想法和打算”^{[12] (第4册, P91-92)}。

正如朱德所说，南昌起义前，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不要军队，把军队交给资产阶级，而片面强调搞群众运动，自己的党员不在军队中当军官，只帮助人家做政治工作，实在很蠢！^{[17] (P163)} 以致在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时束手无策，大革命惨遭失败。这揭示了创建一支受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极端重要性，这就是“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5] (第3卷, P1074)}。

二、南昌起义：新型人民军队建军原则和制度的初创

南昌起义最伟大和最具创造性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诞生了一支完全不同于近代以来“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18] 军阀部队的新型人民军队。“建军总原则，党的领导尊。非军指挥党，惟党指挥军。”^{[19] (P208)} 在“英雄浴血南昌城”“铁流驰骋到南粤”“艰苦转战上井冈”等波澜壮阔史剧中，坚决听从党指挥和坚定跟党走的军魂飘扬在八一起义的军旗上，辉映在南昌起义官兵心坎中，为铲除中国近代以来“军队私有与列强卵翼交织”^[20] 顽疾，解决军队“听谁指挥”和“为谁打仗”两大根本问题开了一个好头、迈出了关键一步。有军必有旗，有旗须有魂。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5] (第2卷, P547)} 这一原则发轫于南昌起义，历经秋收起义、三湾改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赣南闽西苏区开辟和古田会议召开，得以奠基和定型。

南昌起义产生的八一精神，蕴含着新型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是区别于古今中外一切旧军队的根

本标志，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由建党向建军丰富发展的实践过程，又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质”^[21]的科学论述，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增添了新型人民军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1]的特色。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暴动，拉开了独立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和领导武装夺取政权的大幕。南昌起义从酝酿、决策、筹备、发动到南征、转战、会师，从起义宗旨和纲领制定到起义宣言和布告发布，都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南昌起义是“听党指挥”的典范。

在共产国际指导下，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结束了陈独秀的领导，成立了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并同意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派遣周恩来前往南昌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22] (上册, P120)} 7月20日、24日和26日，到达九江的领导人先后举行三次会议，讨论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尔后南下广东，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

8月1日，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由共产党所掌握和影响的二万多官兵浴血奋战，力克南昌。历史证明要改变旧中国社会性质，依靠军阀打军阀是行不通的，必须要由先进政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来完成。正如周恩来在南昌起义胜利后所说：“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来打倒反革命。我们起义成功了，从此这支军队归共产党领导了。”^{[23] (P72)}

军队的性质从根本上是取决于它从属的政治领导力量，没有新型的政党，就不会有新型的治军理念，也就不能解决军队听谁指挥和为谁打仗的问题。^[24]南昌起义是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也是“党指挥枪”建军原则的发轫。起义部队在南征途中响应党的“八七”会议的号召，在汕头大埔会馆召开中共南方局第一次会议，决定“应该明白的将我们党的真面目及政治主张宣布出来”^{[25] (P27)}，公开亮出共产党旗号，抛弃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改用红旗，以斧、镰为标志。同时废弃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改用工农革命军的名称，后在发动湘南起义中，正式打出共产党的红旗。

南昌起义“为我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揭开了序幕”^{[26] (P22)}。从南昌起义决策、发动，到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270多天的峥嵘岁月，起义军纵横赣、粤、闽、湘边界，演绎了从胜利到受挫，从绝境到重生，由城市暴动走向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非凡历程。这取决于党对军队的领导和“继续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废除苛捐杂税，积极预备实力，以扫除蒋、唐等新军阀”^{[27] (P40)}的政治主张和纲领政策。

南昌起义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形成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在新生的人民军队危亡时刻，敢于斗争、力挽狂澜，保存了起义的火种，通过“赣南三整”，“党指挥枪”渐为铁律，政治建军初见端倪。党诞生之后，就开始了对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探索。

在国共合作形势下，从几百名党员发展到大革命后期近6万名党员，特别是“在党直接掌握的军队中，均设有党组织，其组织形式已发展为：团——总支、营——支部、连——小组”^[14]。在南昌起义整个过程中，前敌委员会加强了“党的作用高于一切”原则的贯彻，在各军师建立了党委，各团建立了党总支或党支部，设政治指导员，以体现“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28] (第1卷, P126)}，保证了起义的成功。

起义后又立即对部队进行整编：“第十一军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师各团健全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营建立了党小组；第二十军开始发展党员。朱克靖、聂荣臻、廖乾吾分别担任第九、第十一、第二十军党代表，颜昌颐、李硕勋分别担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师党代表，方维夏、陈恭、徐特立分别担任第二十军第一、第二、第三师党代表。”^{[29] (第1卷, P13)}这是八七会议关于在革命战争中创造新的革命军队，“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强固的本党兵士支部，要有靠得住的忠实于革命的军官”^{[13] (第3册, P34)}精神的具体体现，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潮汕战役失利后，朱德、陈毅率领起义余部转战闽、粤、赣，此时部队饥寒交迫，给养匮乏，疾病流行，缺医少药，四面受敌，孤立无援，不少官兵军心涣散，拖枪出走。^{[23] (P135)}面对部队有顷刻瓦解之危和革命火种随时熄灭的严峻局面，1927年10月初至11月下旬，朱德、陈毅先后进行了以“思想教育、组织整顿、军事训练”为主要内容的“赣南三整”，开始用“铁的纪律凝聚铁的意志、锤炼铁的作风、锻造铁的队伍”^[1]。

天心圩整顿主要是用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信念教育官兵，用俄国革命胜利的历史鼓舞起义官兵的斗志，稳定军心。朱德和陈毅鼓励官兵不要被暂时的黑暗和困难所吓倒，“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30] (上册, P98-99)}。天心圩整顿是转战途中起死回生的转折，留下来的官兵对革命胜利充满希望。^{[31] (P245)}大余整编主要是整顿党团组织和整编部队，将不成建制的部队编为一个纵队，并重新登记部队中的党、团员，成立了以陈毅为书记的党支部，将五六十名党员和部分团员分配到各连队中去，加强了党的基层党组织和部队政治教育工作，使起义军余部成为一支组织精干、指挥灵活的战斗部队。

上堡整训主要是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解决当时部队存在的违反纪律问题，以及只会打正规战，不会打游击战，更不会做群众工作等问题。朱德还认真抓了军事训练，组织习惯打正规战的官兵学习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主要是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以及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战斗队形等”^{[32] (P394)}。

上堡整训力求把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开始从单纯打正规战转向农村进行土地革命，打游击战，使“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32] (P395)}。“赣南三整”将思想教育、组织整顿、军事训练三者有机结合，与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在“在时间上很相近，在做法上也极其相似，都取得了巨大成功”^{[33] (P16)}。从此，“听党指挥”逐步成为永恒的军魂。

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和广大官兵为民奋斗的初心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使命，使党在绝地逢生之际，树立起最坚定、最英勇、最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榜样，对八一精神形成产生了决定性作用。政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所领导的军队的本质和特征，政党领袖的实践活动制约着所指挥军队的发展方向。

周恩来、贺龙、朱德等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周恩来临危受命担任中共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从起义前殚精竭虑地协调各路起义军到力排来自党内张国焘的干扰，从起义时亲临火线指挥战斗到主持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繁重工作，从率领起义军南征广东英勇作战到“流沙会议”上抱病精心安排起义军撤离，“周恩来同志是勇于担当、鞠躬尽瘁的杰出楷模”^[34]，无不体现了优秀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理想英勇奋斗的坚定性和彻底性，他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伟大风范，感召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34]。

贺龙曾以“两把菜刀闹革命”名闻天下，然而其由旧式军人向优秀革命军人的转变，始于南昌起义前后信仰了共产主义，坚定地跟党走。1927年7月17日，在黄石港紧急召开的二十军连以上军官大会上，贺龙痛斥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革命：“我们要走革命到底的路！坚决跟着共产党走，走到底！”^{[35] (P29-30)}当他接到担任起义军总指挥的任务时，贺龙坚定地表示：“我向党保证，我和二十军全体官兵，从今以后就是党的战斗队伍，坚决听从党的指挥，完成党所交给的一切任务。”^{[35] (P42)}

在南征途中，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夙愿得以实现。入党宣誓后的第二天，贺龙便向官兵宣布：“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就是为消灭人吃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万恶社会，进而建立共产主义的美好社会。大家要明确这个远大目标，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里来。”^{[36] (P42)}从此，贺龙铁心跟党走，潮汕失利后回到家乡组建了红二军团，创建了湘鄂边根据地，逐步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共和国元帅。

朱德在南昌起义中立下奇功。“一奇”是在南昌起义中成为“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37] (P47)}。朱德利用曾任南昌公安局长、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及与驻赣滇军熟络的关系，在起义前夕绘制了一幅详细的敌人兵力部署图向周恩来汇报，为攻克南昌打下坚实基础。“二奇”是完成前委交给的特殊“设宴请客”任务。

7月31日晚，朱德在南昌市豪华饭店宴请国民党军四个团级军官，酒醉饭饱后又开打麻将，使敌军群龙无首，期间又得知起义消息已泄露，便迅速报告起义总指挥部，使起义提前两小时举行并取得胜利。“三奇”是以“无限忠诚、光明磊落的坚强党性”^[38]，在危难之时担任起义后期的主要领导人，率领起义军余部浴血奋战，开展“赣南三整”，保存了起义的火种。后又发动湘南起义，在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策应下，在井冈山胜利会师，“点燃土地革命战争的燎原之火”^[38]，开辟了中国革命新局面。

三、八一精神：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承上启下的坐标

中国共产党诞生、新型人民军队创建和新中国的建立，是彻底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三件大事。基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独特的奋斗历程”^{[39] (P2)}，于血与火建军大业中淬炼出的八一精神，在情感层面表现在对共产主义的忠贞和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这一崇高目标的坚韧毅力和坚定决心，集中彰显了新型人民军队的阶级属性和“党指挥枪为原则”的军魂。

在价值层面是最坚定、最英勇、最彻底为人民的现代爱国主义，集中彰显了新型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情操和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及血性胆魄；在意志层面是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冲破框框的勇气和破除条条的胆略，集中彰显了新型人民军队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主体意识和敢于胜利、不怕困难的心理，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形成发展中起到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八一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重要的坐标地位，是由从大革命到土地革命之间中国社会革命和文化思潮巨变的历史境遇所决定的。南昌起义在革命紧要关头，与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共同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新阶段，在回答“要不要继续革命”和“如何继续革命”两大历史性课题中，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毒根与军阀割据混战的根本原因，就是军队私有化。

从八旗军、绿营军到湘军和淮军，从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到奉、直、皖等军阀派系，直至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奉行的是“有军则有权”的封建意识，根本没有社会意识、国民精神和民族精神，只是以谋取私家之利为己任，穷兵黩武，使国家和民族陷入巨大的危机和混乱之中。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人民军队，与古今中外一切旧军队有着天壤之别，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政治集团和军事组织。

在建军过程中形成的八一精神，继承和发扬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21]的伟大建党精神。在探索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道路中，军队听党指挥和为人民打仗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应时而生。八一精神极大地丰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其薪火相传、与时俱进的坐标地位不言而喻。

八一精神是新型人民军队的军魂，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核心价值，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矗立起听党指挥的建军坐标。军魂是一支军队凝心聚气的底蕴和旗帜，是一支军队忠诚可靠和听从指挥的保证，是一支军队永葆纯洁性和战斗力的动力源泉。

军队的核心价值，决定了这支军队的未来走向和前途命运。“信念坚定、听党指挥”是八一精神的精髓，体现了革命军人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不懈追求和矢志不移跟共产党走的价值理念。陈毅曾说，南昌是中国工人阶级独立领导并以革命的武装斗争为主要的革命方式始发地^[40]。

从“叶剑英三献妙计”，在小划子会议上做出与军阀张发奎决裂的正确决断^{[41] (P146-148)}，到“刘伯承智勇担当参谋长”，赢得了周恩来和参谋团所有成员的一致肯定^{[41] (P149-151)}；从“聂荣臻单骑策反”，带来三千子弟兵^{[41] (P151-152)}，到“陈毅矢志追队伍”，甘当连队指导员^{[41] (P171-173)}；从郭沫若不惧艰险“赴戎机”，南征途中加入共产党^{[41] (P169-171)}，到“陈赓遇险施巧计”，“笑谈去见马克思”^{[41] (P176-178)}；从“不老‘八仙’征南粤”³到四大“女金刚不让须眉”⁴；从朱德亲临大柏山火线，“从已牺牲的战士身边，

拿起一支步枪，和战士们一起站在战壕里，向敌人射击”^{[42] (P85-86)}，到周恩来身患疟疾、发着四十度高烧仍坚定地“要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42] (P85-86)}，这些都诠释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为促进社会进步而奋斗、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执着信念和跟党走的坚定决心，是党的初心使命的昭告和人民军队核心价值的迸发。

八一精神体现了人民子弟兵反帝反封建决心和矢志拯救民族于水火的爱国主义精神，彰显了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进一步筑牢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发展壮大的根基。中国共产党缔造的军队，是最坚定、最英勇、最彻底为人民献身的武装集团，“不怕牺牲、为民奋斗”是建军精神的魂魄，体现了革命军人最坚定的爱国主义情操和最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南昌起义“原为救国救民”^{[27] (P43)}，其“为最苦人民的奋斗”^{[43] (P65)}、“力谋民众利益”^{[44] (P136)}的暴动主张，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和意志的反映，表明人民军队诞生之时，就矢志不移地投身中国人民求解放和幸福、为中华民族独立和复兴的伟大事业，就义无反顾地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连在了一起。^[1]从“红带兵”“激战天主堂、鲜血洒贡院”，到涌现出无数个“陈守礼”^⑤式英雄；从“军民抢修涂家埠大桥”，确保起义部队云集南昌，到“深情厚谊的一万银元收条”，南昌市民踊跃捐款捐物支持起义军^{[41] (P154-155)}；从“飞转的缝纫机”，南昌工人连夜鏖战赶制军服^{[41] (P153)}，到“临时理发店免费剃新容”，市民踊跃贡献微薄力量^{[41] (P153-154)}；从“大水缸茶香四溢慰义军”，洋溢出军民鱼水情^{[41] (P152-153)}，到“誓死杀敌”和“革命者来”标语在南征途中屡见不鲜^{[41] (P179)}，证明了“人民军队从她诞生的那天起，就将自己置身于党的领导下，将‘人民’两个大字写在自己的旗帜下”^{[45] (P43)}。

八一精神建筑于人民军队创建的峥嵘岁月之中，反映了起义官兵无产阶级英雄主义气概，凸显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军事文化品质。中华民族血脉中有着深厚的英雄主义基因，在融入无产阶级思想品质和道德情操后，传统的英雄主义进入到崭新阶段和最高境界，而这一质变的标志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城英雄壮举中形成的八一精神。南昌起义首次将“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5] (第2卷, P541)}付诸实践，创造了彪炳史册的“八个一”^⑥，彰显出人民军队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用血性胆魂宣告了在革命战士面前，没有完不成的任务、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和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1]

八一精神的风范是以“实践第一”和“敢”字当头的气魄冲破条条框框，闯出革命的新天地。正当南昌起义准备工作进入关键时刻，起义遭到张国焘的多次干扰，他先是提出“暴动宜慎重”，后又以起义宣言和政治纲领需要修改，提出“不妨把这次武装行动只作为一次‘兵变’，不发表宣言和政治纲领”^{[46] (P36)}，以此推迟起义时间，达到取消起义的目的。对此，周恩来明确回答“我们是武装夺取政权，不是什么‘兵变’”^{[46] (P36)}，决定立即起义。“人民武力起洪都，屈折艰难史所无。”^{[47] (P207)}正是南昌起义的英雄群体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15] (第1卷上册, P300)}，“造就了人民军队对党的赤胆忠心，造就了人民军队和人民的鱼水情深，造就了人民军队为党和人民冲锋陷阵的坚定意志”^[1]，开启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道路。

八一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范例，昭示了一代英雄豪杰和革命群众超凡卓越的实践意识和创造心态，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万古长青的生命力。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为主动。”^{[5] (第4卷, P1516)}这“主动”体现在中国近现代以来文化变迁序列和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灿若星辰的各个革命精神以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和载体在不同时空绽放，产生了博大精深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南昌起义是八一精神形成的母体和来源。”^[48]八一精神“来源于革命人民英勇顽强的实践，它不仅是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的体现，而且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丰硕成果”^[49]，体现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格力量，洋溢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境界。“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3] (第1卷, P456)}从“南昌首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50] (P159)}，到“红军荟萃井冈山，主力形成在此间”^{[50] (P203)}，开辟了中国革命新局面；从“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51] (P652)}的秋收起义，到“支部建在连队上”^{[5] (第1卷, P65)}、官兵团结平等的三湾改编；从“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49] (P62)}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反“进剿”和“会剿”，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49] (P131)}的赣南闽西工农武装割据；从“民主整军”和“军政整训”

的新泉整训，到“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古田会议召开，“党指挥枪”原则终于形成，以八一精神为源头的建军精神亦磅礴而出，南昌起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丰富和发展的重要节点。

四、结语

建党、建军、建立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时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变”“大事件”。在建军辉煌历程中产生的八一精神，源于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思想文化的时代结晶，集中体现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核心价值观念。八一精神以听党指挥的忠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情操和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丰富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7-08-02.
- [2] 叶校. 八一精神内涵的概括表述[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6, (4).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4] 刘孚威. 井冈山精神——中国革命精神之源[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
- [5] 毛泽东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6] 鲁迅. 鲁迅全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7] 刘利华. “五四”精神的特征[N]. 光明日报, 1999-04-23.
- [8] (德) 马克思. 资本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 [10] 毛泽东文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11] 陈独秀. 革命与武力[J]. 向导, 1926, (11).
- [12]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 [1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 [14] 汤家玉. 陈独秀在建军问题上的态度与立场[J]. 党史纵览, 2018, (2).
- [1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 [16] 李永芳. 农民武装在北伐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J], 中州学刊, 2017, (12).

-
- [17]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南昌起义[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
- [18]张开森. 蒋介石对军事失败的检讨[J]. 炎黄春秋, 2004, (10).
- [19]胡国强. 朱德诗词赏析[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 [20]叶桢, 李芸. 从打响“第一枪”到“党指挥枪”:人民军队魂魄的铸成——兼谈八一精神的核心价值[J].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 2018, (1).
- [21]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1-07-02.
- [22]李维汉. 回忆与研究[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3.
- [23]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南昌起义[M].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 [24]李芸, 叶桢. 从南昌起义到古田会议:人民军队“听党指挥”原则的确立[J].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 2016, (1).
- [25]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亲历南昌起义[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
- [26]何友良. 苏区研究论文精粹[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 [27]魏宏运. 南昌起义[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 [28]姜思毅. 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史[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1.
- [29]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0.
- [30]刘树发. 陈毅年谱[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 [31] (美) 史沫特莱. 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M]. 梅念, 译. 上海:三联书店, 1979.
- [32]朱德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
- [33]刘金田. 红色精神[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1.
- [34]习近平. 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8-03-02.
- [35]黄霖. 南昌起义亲历记[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
- [36]刘树发, 王小平. 贺龙口述自传[M].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0.
- [37]袁伟, 吴殿尧. 朱德军事活动纪事: 1886-1976[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6.

[38] 习近平. 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 13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11-30.

[39] 杨河.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读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40] 陈毅. 关于“八一”南昌起义[J]. 近代史研究, 1981, (2).

[41] 叶桢, 杨海贵. 八一精神[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9.

[42] 八一南昌起义写作组. 八一南昌起义[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43]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革命史研究室. 南昌起义资料[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44] 李弘. 放眼看南昌起义[M]. 北京: 国防大学出版社, 2007.

[45] 汪立夏. 红色江西[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6.

[46] 吴珏, 刘华清. 问鼎天下: 1921-1949[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4.

[47] 王小玲, 曹佳倩. 八一记忆-文物背后的故事[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5.

[48] 姜廷玉. 关于八一精神的历史基础和深刻内涵[J].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 2015, (1).

[49] 叶桢. 试论八一精神与红色文化的渊源及流变——兼谈八一文化品牌的塑造[J]. 江西社会科学, 2011, (12).

[5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朱德诗词集[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51] 吴正裕. 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注释:

1 各军党代表都由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汪精卫兼任, 副党代表实际负责军中的政治工作。

2 周士第任团长的第二十七团、卢德铭任团长的武汉政府警卫团、蒋先云任团长的第七十七团、朱德任团长的南昌军官教育团、张兆丰任师长的国民军第五军第三师等部队以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等学员, 都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革命武装力量, 是陆续参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三大起义预演的泸顺起义的重要革命力量。

3 起义军南征过程中, 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方维夏、彭泽民、谭平山、高语罕、姜济寰几位 50 岁左右的老同志以昂扬的革命意志和乐观的革命精神为人称颂, 被称为起义军中的不老“八仙”。

4 四大“女金刚”指南昌起义女兵队伍中杰出的战士谭勤先、杨庆兰、王鸣皋、陈觉吾。

5 陈守礼, 南昌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 24 师 72 团教导队队长, 在攻打贡院时壮烈牺牲, 被誉为人民军队牺牲第一人。

6 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创建一支党独立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开启了一条党领导革命战争和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武装起义和革命暴动，产生了周恩来、朱德等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成员，涌现出一批人民军队的栋梁和开国将帅，铸就了一种光辉永存的革命精神八一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中矗立起一座建军精神新坐标。